

关晓丽 关大伟 ◆ 著

中国社会阶层 结构演变 新 视点

Perspective
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吉林大学 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新视点

关晓丽 著
关大伟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新视点/关晓丽, 关大伟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601-3751-3

I. 中… II. ①关…②关… III. 阶层—社会结构—研究—
中国 IV. 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7324 号

书 名: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新视点

作 者: 关晓丽 关大伟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黄凤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总印张: 16. 375 总字数: 216 千字

ISBN 978-7-5601-3751-3

封面设计: 孙 群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印刷

2007 年 8 月 第 1 版

200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edu.cn

前 言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变迁，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即完成了由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到中间阶层占社会多数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呈现出社会稳定、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生活较为富裕的“盛况”。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程说明，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突出问题，没有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我国从建国以来到 1978 年之前，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分配上奉行平均主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官本位制度、工作单位制度等，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强化了城乡分割，社会阶层结构较为简单。以对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依据，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式结构。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巨大分化，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被打破，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社会阶层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呈“葫芦型”。这种结构，社会中低收入者阶层过大，主要集中在农村近 4 亿农业劳动人口；中等收入者阶层过小，不能构成社会结构的主体。显然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而且存在诸如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定、抵御风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到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这是本文要着力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社会

阶层结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说其大，就是这个问题的涵盖大，而且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说其复杂，就是对它的研究需要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且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进行的，不能不受世界其它国家社会结构演化的影响。为此，对阶层结构问题研究，需要明确以下问题：一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研究的时间跨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社会结构现代化大约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就是一些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左右时间。要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清楚，也应当确立相应的时间跨度。本文把这个时间跨度确立在 20 世纪中叶到 21 世纪中叶，就是建国以后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时间内。这正好是一个世纪。选择这样的历史跨度，有助于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历史脉络搞清楚，同时也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相一致，就是我国在 21 世纪中期实现经济现代化了，那么社会阶层结构也实现相应的现代化，这体现了社会协调发展思想。二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要合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理论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已有成功经验和较为成熟社会分析理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而且中国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阶层演化的机理相同。合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用以指导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就可以避免失误，少走弯路。三是指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应坚持什么样的社会学说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这是一种以经济利益对立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我国从 1956 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随着对立的经济关系丧失，这种方法就失去了现实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与阶层加速分化相伴，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分析学说，如阶层分析、利益群体分析、身份分析等。本文

认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问题，应坚持以阶层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这是一种以多元因素为依据的分析方法。它可以经济关系、收入、知识水平、政治地位、活动方式等作为分层依据，这样划分阶层的标准就具有了多变性。它强调各阶层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协调和整合来处理各社会阶层的关系，符合中国阶层关系的实际，是重要的社会分析工具，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四是推动社会阶层结构需要运用多种手段的问题。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社会分工造成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教育发展以及先进文化思想传播，对阶层分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相应地要采取综合措施。如果措施过于单一的话，就可能造成政策措施的空位，不利于阶层结构演化高度化，甚至会造成社会结构的畸型。而采取经济、政治、文化多管齐下的综合措施，社会阶层演化就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结构现代化化就会相得益彰，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之演化	(1)
一、1949 年以前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	(1)
二、1949 年 - 1978 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 ...	(5)
三、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化	(12)
第二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成因	(25)
一、政治和政策推动	(25)
二、社会分工的发展与变化	(33)
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优化	(37)
四、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	(44)
五、教育发展的推动	(46)
第三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社会影响	(49)
一、社会阶层分化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积极影响	(49)
二、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57)
第四章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层结构之演化	(67)
一、工业化革命与阶层结构演化	(67)
二、城市化与阶层结构演化	(73)
三、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与阶层结构演化	(75)
四、中间阶层不断发展壮大,“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	(78)
第五章 西方部分发达国家近 20 年社会结构的变化	(89)
一、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89)

二、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100)
三、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119)
第六章 西方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	(132)
一、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132)
二、帕雷托的精英理论	(135)
三、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	(137)
四、布劳和邓肯的社会职业分层理论	(139)
五、达伦多夫的权力分层理论	(141)
六、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层流动研究	(142)
第七章 由阶级分析为主转向阶层分析为主	(146)
一、以“阶级分析为主”、以“阶层分析为辅”的社会分析 学说	(146)
二、以“阶级分析为主”的社会分析学说的不适应性	(150)
三、实现以“阶级分析为主”向“阶层分析为主”的转变	(154)
第八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模式	(159)
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处在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 变的过渡阶段	(159)
二、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进程的不适应性	(170)
三、“橄榄型”是中国社会和谐阶层结构的最佳模式	(175)
第九章 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及处理方式	(184)
一、新时期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表现	(184)
二、新时期各阶层矛盾的特点	(192)
三、新时期各阶层矛盾的根源	(194)
四、运用阶层分析方法整合阶层矛盾	(198)

第十章 实施经济推动加速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进程	(201)
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力分布的合理化	(201)
二、用城市化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07)
三、理顺分配关系,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减少贫困者阶层	(214)
第十一章 实施政治文化导入 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	(219)
一、发挥政党及政治制度对社会阶层的整合作用	(219)
二、发挥文化对社会阶层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223)
三、发挥教育对社会阶层的提升和促进作用	(230)
第十二章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234)
一、社会分层视野下的社会和谐	(234)
二、当代社会分层的和谐表现及其影响	(239)
三、健全社会分层机制,促进阶层结构和谐	(244)

第一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之演化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现代化必然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或者说，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实现了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化。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1949年建国之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推行市场经济。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几经变迁。

一、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里的利益集团，除王侯将相等少数特权阶层以外，还有士农工商的划分与等级排列。辛亥革命瓦解了一千多年稳固的封建社会秩序，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和现代民主政体的发展框架，希望逐步由训政发展为宪政，把中国引向帝王制以后的现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工业社会的来源是欧洲工业革命，它宣告了贵族等级制度的终结，培育了一批脱离世袭等级结构的新兴社会团体，那就是资本家和工人。从帝制时代的等级体系中脱胎而来的中国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有了现代的框架，但是并没有因此很快发育出现代社会的基本因素，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

第一，工业基本上是外资和外商的附庸。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19世纪的60年代，即清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此后虽有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但无论在投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外资和外商都占据主导地位。到1936年，外资经营的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

煤为 56%，发电量为 55%，铁矿石为 99%，棉布为 64%，卷烟为 58%。

第二，工业集中分布在少数城市。1930 年，全部外商投资的 43% 集中在上海，34% 集中在东北。在整个工业中，东北和关内沿海六省集中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80%；其中东北工业又主要集中在辽宁，关内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无锡、青岛、武汉、太原和重庆。1949 年，仅上海一市的工业产值就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25%。

第三，工业整体上发展迅速，但仍然没有成为人民生计的主导力量。1894 年，工人总数不到 1 万人；1927 年近 260 万人；1949 年大约 800 万人。1933 年，全国总人口大约 4.5 亿，当年的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 0.7%；1949 年的人口如果以 4 亿计，当年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到 1.5%。

第四，尽管农业仍然是 90% 以上人口的主要生计，但是，农业生产的模式，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使用的仍然是唐代就已经基本定型的工具，耕作制度也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旧制，一些技术的引入、模式的改变并没有能够使农业产业化。

第五，农民的生活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的传统。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农村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地矛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个家庭只有几亩农地，自有的劳动力足够完成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作业。加上租佃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像工业化的大生产那样进行组织协作。此外，农村工副业与农业的互补，使农村成为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封闭社区，农民走不出传统的生活框架。还有，工业发展的弱势没有能力吸引大量的农民加盟，农民自然也离不开土地。

体制的变革虽然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完成，但社会的变迁不仅需要时日，还需要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社会，譬如 16 世纪的荷兰，即使有特别发达的商业，并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大商人，也没有改变贵族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社会权力结构。只

是等到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当工商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支配力量以后，贵族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贵族等级制度才由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所代替，即从传统的贵族与平民的身份等级制度演变为依据财富、声望和权力分层的等级制度。

与旧的贵族等级制度一样，新的社会也是一个结构性不平等体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看到了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之间在利益上的尖锐对立和地位上的不平等，指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的根源在于财产权利。财产私人占有的合法性支配了财产，支配人的合理性，也使人支配人具有了合理性。顺理成章，在人的生存权利与劳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财产的不平等占有只能从其他因素中产生，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人对人的剥削”。剥削与被剥削自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但却不一定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马克思称之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个从工业产业化过程中推导出来的理论，被运用到了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佃户与地主之间在利益结构上的尖锐对立并不亚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自然而然地，中国社会的分层体系也被理解为各个阶级的存在。

但是，革命理论的移植并不能改变一个社会的特质，自从推翻帝制之后，自由经济虽然在中国受到推崇，私有财产也受到法律保护，但是主导国家经济的力量却并未因此像欧洲工业革命以后那样成为工商资产阶级，在封建等级制度被推翻以后立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而是支配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经济框架的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

斯廷奇考姆（Arthur L. Stinchcombe）曾经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及其社会结构特点：庄园式、家庭租佃式、家庭占有式、种植园式和大农场式。从庄园式到大农场式，农业的产业特点不断突出，商业性不断强化，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关系也从人身依附与被依附关系转变为法律上的平等关系。根据他的说法，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业基本上处在家庭租佃式阶段，社会中的阶层结构不同于法律上所规定的群体关系，尽管法律规定地主与佃农之间人身平等，但在土地为少数

人所有的地区，人身依附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结构形式；不同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更有天壤之别。乡绅们可以住在城镇，在城镇接受文化教育，并为仕途努力，他们基本上不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农业劳动。而佃户则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通过农业劳动，获得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

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分层体系中，其基本特点是由工业产业的业缘关系、市场经济体系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培育和发展出来的集体意识，边界清晰的社会利益团体，以及建立在利益团体整合基础上的职业规范、法律秩序和法理统治。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其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以地主乡绅为中心，由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所构成的土地占有者和土地租佃者之间依附式的关系体系。维系这个结构体系的基础，是在儒家思想、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家族制度，具体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常道德礼治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长老统治。

如果说财富占有在社会地位获得中具有重要位置，在乡土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1933年在广东番禺，10个村的统计结果表明，农民耕种的土地有35%~84%是从地主那里租佃来的，其中8个村的租佃比例在55%以上，拥有土地的人，在村中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

在工业人口只是极少数，农村人口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仍然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时候，在农业并不成为产业而仅仅是维系人们生存的主要来源的时代，就像中国历代王朝后期一样，土地占有者和土地租赁者之间的矛盾没有条件产生一个缓解冲突的机制，随着矛盾加剧所产生的只能是大量愿意参与革命的社会群体。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些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得了政权。但是，胜利并不是一切，在硝烟散尽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仍然是那个有极大潜力支持革命的乡土社会。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难题：要么让农民支持另一场革命，要么改造乡土社会，使其远离革命。

二、1949 年—1978 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诸多措施来改造中国的乡土性社会。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建立了特征鲜明的身份制体系。具体而言这个身份制体系有如下特点。

1. 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分割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1979 年，也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实行着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一个人一旦在某地注册了户口，那么迁居它地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户籍制度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将人们分为两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而所有持农村户口的人均被称为农民，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户籍身份的改变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极难进入其他身份群体。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其他生活资源的供给制度、人事与档案以及劳动用工制度，在农村与“公社制”紧密配合，在城市与“单位制”紧密结合，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行政控制之下，从而更为严格地限制了城乡间的社会流动。

中国城乡户籍制度的形成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新政权刚建立的初期，中央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控制尚不十分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公民尚有迁居之自由。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随着工业化的高涨，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并由此引发了粮食、副食供应、交通、住房、城市服务等诸种问题。于是，中国曾先后两次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限制农民流入城市。一次是在 50 年代中期，中国曾专门为“劝止农民流入城市”发了指示，并从 1955 年 6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的、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后的 1959 年、1960 年，由于当时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食品、生活用品等供应上的短缺，中国便开始实行了几乎完全制止农民流入城市的政策。按照规定，我国每年只允许 1.5% 的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即城市户口），这里面包括一些因工作上有成绩而被提升进城的干部和干部家庭

成员，对于一般农民来说是绝无可能进入城市的。这种政策一直执行到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异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根据。从总体上说，城里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乡下人的，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各个方面所享有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所不能比的。表 1-1 是改革开放前城乡消费水平的比较。^①

表 1-1 中国城市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消费水平(元,按当年价格计算)		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之比 (以农村居民为 1)
	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1952	62	149	1:2.4
1956	78	197	1:2.5
1957	79	205	1:2.6
1959	65	206	1:3.2
1960	68	214	1:3.2
1963	89	222	1:2.5
1964	95	234	1:2.5
1969	108	255	1:2.4
1972	116	295	1:2.5
1975	124	324	1:2.6
1976	125	340	1:2.7
1977	124	360	1:2.9
1978	132	383	1:2.9

①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史统计资料汇编》整理。

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大大高于农村居民的,前者为后者的倍数在 2.4 到 3.2 之间浮动。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享有其他多方面的福利条件,例如,各种食品的补贴、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单位提供的子女教育等等。而这些都是农村居民所享受不到的。这样,当时的城市与农村居民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模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模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在城乡之间有种种的限制,例如粮票和副食证的制度就是很重要的限制。当时,城市居民每月都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粮票等票证,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食品,也才能在城市中生存。农民没有粮票,因而也就买不到食品,即使他们私自来到城市中,也无法在城里生存下去。当时,农民可以改变自己身份的渠道也并非没有,但却十分窄小。对年轻的农村居民来说,考学是一条主要渠道。如果一个人通过高考,考入了高等学府,那么,他(她)的农村居民身份就可以改变为城市居民身份。农民称之为“跳龙门”。但是,由于农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真正能“跳龙门”的是极少数。

由于农民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城乡高低差异很大的体制自然就造成了我国社会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型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没有流动的自由,这就将中国人口中的最大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积极性束缚住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原因之一。

2. 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把城市中的就业群体区分为干部与工人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前,城市中的就业者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干部指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个人能进入这种身份的关键是要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而列入干部编制。这种所谓列入编制靠的是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我国城镇中的正式就

业者都有一份由他所在的组织（单位）保存的档案。档案记载着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家庭背景、亲属状况等。档案编制身份基本上是两类，即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区分不仅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体现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两种身份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均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干部编制的待遇要大大优于工人。因此，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希望被列入干部编制。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被划为工人身份的人来说，他们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

那么，什么人才能被列入干部编制呢？首先，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凡是由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等以上学历的学生，在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后，均可取得干部身份。这样，那些不是由全日制学校毕业的职大、函大、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干部培训班毕业的学生，他们虽然取得了大学专科的文凭，但却不能直接转为干部编制。其次，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聘用到干部岗位上的人，可以是干部编制。但是这种干部指标往往是很有限的，而且，对于由这种途径进入到干部队伍中来的人往往有较严格的要求。例如，在学历上，常要求有大专以上学历，这样，前述的那些由非全日制职大、业余大学等毕业的学生，就要等待干部指标，有了指标后才能转入干部编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提拔了很多干部。据统计大约有 200 万人。这些人虽然在干部的岗位上，但还保留着原来的身份，俗称“以工代干”等。这些“以工代干”的人，并不能列入干部编制，而只能仍保留在工人等编制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分配给了基层单位较多的干部指标，才逐步解决了“文革”后遗留的较严重的“以工代干”问题。今天，“以工代干”的还有，这就要等待上级分配给干部编制指标，然后才能转干。再其次，由部队转到地方上来的转业人员。部队转业人员在部队一般都是连级以上的干部，到地方之后当然都列入干部编制。部队中的一般士兵服